

辽 金 元 明 南 梁 陈 魏 北 周 隋 南 北 旧 新 旧 新 宋 辽 金 元 明
史 史 史 史 齐 书 书 书 齐 书 书 史 史 唐 唐 五代 五代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

精 华

三 国 志（一）

主编 廖盖隆



吉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读《三国志》

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文史古籍，其中《二十四史》中的《三国志》，是他圈点批注较多的史书之一。

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黄巾起义开始，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增补了许多材料。《三国志》，除了裴松之有长篇巨注外，为其作注、旁证、校勘的，到清代已有顾炎武、何焯、章钜等 20 多家。其中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汇集了诸家校语、评注，可以说是历代注解《三国志》的一次总结。毛泽东读《三国志》留下较多批语的，便是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毛泽东读“三国”的批语大致有以下几类。



为曹操翻案

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曹操历来被看作篡汉的“奸雄”。特别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把曹操视为“旷世奸雄”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毛泽东则一反传统观点，肯定这一历史人物的才略和功绩。50年代末他谈到历史学家翦伯赞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时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一次在北戴河，毛泽东曾经充满感情地说：

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61页）



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刘表传》，在批注中评论刘表王统与曹操同时的历史人物时，也曾自然流露出对曹操的褒扬态度。陈寿写道，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批注：“虚有其表”。裴松之注引司马彪《战略》说，刘表初入荆州时，曾诱杀在当地作乱的刘姓宗室。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划出曲线，又在天头批注：“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孟德，即曹操。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不杀降的事例相当多。为追击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后来成为曹操的主力。刘备来投奔，有人劝曹操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却回答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张邈叛，劫持曹操部下毕湛的母弟妻子，曹操准许毕湛前往敌方，而毕湛表示绝无二心，曹操嘉许，毕湛为之感动流涕。然而毕湛却随即叛逃。后来曹操击破敌军，生擒毕湛，众人都为之担忧。曹操则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又任其为鲁相。曹操任命的河内太守魏种曾经受到特殊信用，张邈叛乱时，曹操曾感叹道：“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后来听说魏种也投靠了叛军，愤怒地说：“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然而后来平叛胜利活捉魏种后，曹操又说：“唯其才也！”于是释其缚而用之。”此外，为张绣、关羽、张鲁等等，归降曹操后，也得封侯或重用。这些都是毛泽东所批曹操不杀降将的例子。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说，刘表曾“南收零桂，北据汉



川，地方数千里，举甲十万。”卢弼在《三国志集解》注说，刘表此时不再向汉王朝“供职贡”，并非法擅自“郊祀天地”，服饰器用也仿拟皇帝。毛泽东在此又批注：“作土皇帝，孟德不为也”。毛泽东把曹操和刘表加以比较，再次贬刘褒操，表示了对曹操的肯定态度。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其内容是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否认“有不逊之志”的一篇语颇恳切的政治声明。其中说到“设使国家无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表示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若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引述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认为这篇声明是“志骄气盈，言大而夸”，是“为奸雄欺人之语”，并认为陈寿在《三国志》里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等等。毛泽东对这些注文加了圈点，又批注道：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息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8页)

毛泽东态度鲜明地否定了曹操的攻击，以为那些评语多是缺乏历史根据的诬蔑不实之词。所谓“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见于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一诗。鹦鹉洲，传说是黄祖杀害名士祢衡之处，因祢衡绝世之作《鹦鹉赋》而得名。



全诗为：“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筭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鸚鵡》，落笔起群类。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鸢鵂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薰不忍生。”祢衡是汉末狂士。孔融爱其才，多次称述于曹操。曹操想见他，他却称病不见。后来答应了，却坐在大营门口，“以杖捶地大骂”。曹操以其素有才名，不忍杀之，便把祢衡送到刘表处，后又辗转至黄祖处，结果因“言不逊顺”遇害，时年二十六岁。“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按史家解释，“盖言魏武经营天下，而视之直作蝼蚁观者，唯一祢衡也”。毛泽东所批的“此为近之”，可能是说卢弼等对曹操的注语，与轻狂傲慢的祢衡相近。

毛泽东 1961 年 8 月 25 日致胡乔木的信中曾引用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1954 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散步，喜欢背诵曹操的名诗《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面对浩瀚雄阔的海面，产生了与曹操这位历史人物的心理共鸣。他找来地图，查证出“曹操是来过这里的”，又说：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写道：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见《毛泽东诗词选》）



世事翻转，时代演进，面对千古不变的“萧瑟秋风”，作为推动历史的伟大人物，毛泽东和曹操的内心确实有相通之处。毛泽东在同子女谈话中曾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还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也表现出对于曹操这位历史人物的钦敬之心。

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也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曹操毕竟是功大于过，但毛泽东并不讳言他的失误。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五百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头送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害。’”（见《毛泽东读书笔记》第1014页）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叙，建安八年，曹操曾下令说：“《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储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此认为，曹操亲率大军攻吴，招致“赤壁之败，将抵何人罪？”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一个重大失误。而曹操在这



里也没有自我批评，可见是言不由衷的。

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虽为曹操翻案，但并不因个人喜好来评价历史人物，表现出一种政治家的客观气度。

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说，曹操军与孙权军对峙，孙权乘轻船入曹军，“行五六里，迥还作鼓吹。”曹操“见舟船器械军伍肃整，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宋代词人辛弃疾的名作《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用此典：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十分喜爱这一词作。1957年3月，毛泽东由南京飞往上海，途中飞临镇江上空时，亲笔手书这首词，并向同行的工作人员解说这首词的内容及用典。孙权当曹操的大军压境相威逼时，力排众议，作出联刘抗曹的决定，因此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毛泽东总结历代政治经验得出应多谋而“识时务”，在关键的历史关头“审机独断，往往成功”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评价



三国的历史人物时又被进一步阐发。

郭嘉是三国时的著名谋士，他曾北上会见袁绍，建议袁绍迎接天子到邺县建都，袁绍未采纳，郭嘉认为袁绍“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之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离袁绍而去。后郭嘉由荀彧推荐见曹操，曹操得郭嘉十分高兴，认为“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曹操征吕布，三战破之，吕布退而固守。当时“士卒疲倦”，曹操欲引军还，郭嘉则建议乘胜而“急攻之”，又举项羽失败的史例作为鉴戒，曹操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擒杀吕布。又如曹操欲速征刘备，议者担心出军后袁绍袭击后方，曹操疑而不动，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认为袁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而刘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指出“此存亡之机，不可失也”。于是东征刘备，刘备败逃，而袁绍果然按兵未动。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孙策“将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郭嘉则分析说：“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后来孙策临江未济，果然死于刺客之手。曹操破袁绍后，又击袁谭、袁尚，连战皆胜，众将都要乘胜进攻，郭嘉则认为袁绍二子“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建议先南征刘表，以待二袁自变，然后击之。果然如郭嘉所料，曹操回军而北，消灭了二袁。在曹操准备北征袁尚及三郡乌桓时，不少人畏惧刘表会派刘备袭击后方，也是郭嘉分析形势，认为刘表与刘备也存在矛盾，“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曹操于是决意北进。郭嘉又建议说：“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为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曹操于是率军密出卢龙寨，大



破乌桓。

1959年3月2日，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

毛泽东很同意曹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从而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能用人；一是见事迟，得计迟，这样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慢半拍。而与袁绍相比，毛泽东则对郭嘉十分赞赏。

1959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向到会的党内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据薄一波回忆：

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毛泽东还说：

“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载



198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与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又说道：

“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

毛泽东的说法，大约根据《三国志·魏书·郭嘉传》中的这一记载：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据李锐回忆，毛泽东在7月17日下午5时至夜10时与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中，又谈到“袁绍之优柔寡断，不会用将。《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

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徽，张治中、罗瑞卿同行。毛泽东在火车上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对于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关于东吴名将吕蒙苦学而致“学识英博”的记述很感兴趣。孙权曾经劝吕蒙“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以“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推托，孙权以自己读书而“自以为大有所益”开导他，又以“意性朗悟，学必得之”相鼓励，还说道：“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吕蒙于是“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很快就令士人“刮目相待”。《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赞许道：“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谄郝普，擒关羽，最其妙者。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之所以“有谋



断，识军计”，“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不再仅仅是单纯武将形象，都得益于读书学习。

《吕蒙传》记叙，鲁肃死后，吕蒙代之统兵与关羽对峙。这时，关羽正在攻打曹魏占据的樊城，吕蒙上书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诡计”。这是指吕蒙的计谋而言。后来关羽果然中了吕蒙之计，抽调荆州后方大量兵力赶赴襄阳、樊城前线，吕蒙随即轻取荆州，关羽在回兵时，也遭擒杀。这是吕蒙“诡计”所建的一大奇功。

视察途中毛泽东在闲谈中说：

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摘自余湛邦《张治中将军随同毛泽东巡视在江南北的日子》，见1983年12月12日《团结日报》）

毛泽东还对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说：

“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



毛泽东之所以向高级军官推荐《吕蒙》传，是因当时的高级军官大多是和吕蒙一样的行伍出身，吕蒙通过刻苦读书，从普通士兵成为有勇有谋的高级将领，而读书学习是吕蒙的“有谋断、识军计”的重要原因，因此号召我党高级干部要读《吕蒙传》。

毛泽东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谋”，认为“只有多谋，才能善断”。他多次提倡开动脑筋这个专门思想的机器，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毛泽东说：“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欲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为了“使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不仅要研究现状，还要研究历史。毛泽东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



革命问题，”这种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所谓“多谋”，还包含“依靠群众”，“倾听人民群众意见”，“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以避免“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等。而所谓“善断”，也包含在“战略眼光”方面“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一方面善于“持重待机”，一方面避免“迟疑坐困”的错误，以及要具有“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具有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用清醒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的能力等。

毛泽东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如果像毛泽东所指出的，如“袁绍之优柔寡断，不会用将”，则难免导致事业挫败。毛泽东从读史中得出戒鉴，提倡“多谋善断”，这正是毛泽东自己的领袖素质和领导能力及政治风格，同时他也不希望自己队伍中的领导干部出现袁绍这种短见而刚愎之人。毛泽东读史是为了致用，历史也是教育干部的好教材。

五斗米道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并亲自写了两个批语。第一个批语写于1958年12月7日: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当<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



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巾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

十二月七日,在武昌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2—147页)

毛泽东将中国古代如黄巾起义这样的大规模的农民暴动，称作“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其性质虽然与现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毛泽东注意到，“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就是说，是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又“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也“带有封建性质”的农民斗争，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历史继承关系。毛泽东“感触”到农民的“心情”与“梦想”“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性质，然而当时他对此显然主要是从积极的方面予以理解的。这个批语的铅印件，被作者用墨笔划去，又另写了一篇。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印发的是后一个批语，印在《张鲁传》的篇头：

张鲁传

(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九，裴松之注)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